

## 第五章 結 論

本文的中心論題為「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布」<sup>470</sup>，在方法層面是以日本方言地理學的思路為基礎（第一章第二節）。以內容言之，則是以澎湖群島閩方言與區域文化史為主軸，關於這個課題有兩個要點：

一，回應丁邦新（1992）先生所提出「方言區域史」的主張（第一章第一節）：檢視日治時期澎湖群島島名、地名譯音語料，並以「吉貝」、「目斗」的音讀、意涵與南島語作一聯繫與思考。

二，關於澎湖群島日治時期人口普查、族譜以及《明實錄》所記載的海賊史料，我們認為，探討移民與方言形成的課題，應該以文獻語料與方言材料的接軌研究為論述的前提。

至於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類型與地理分布的課題主要有三：

一，聲母結構  $\text{ʔ}$ 、 $\text{ϕ}$ 、 $\text{h}$  的類型與地理分布（第三章第一節、第四章第一節）：閩方言聲母結構呈現重唇、輕唇與喉部擦音的「三角對當」（triangle correspondence），以及重唇音、喉擦音「兩項對立」（binary opposition）的兩種區域類型。「三角對當」的構成原則在於輕重唇的發音部位相同，輕唇音與喉擦音的發音方法相同，保存這種類型的區域，以閩方言內陸區域為代表，《建州八音》非母「餘音」字組，以及現代閩北區域方言調查報告亦可得到佐證。閩方言島嶼區域呈現此種類型模式可以海南島為代表，澎湖群島西嶼鄉竹灣村、湖西鄉南寮村則殘存少數語例。「兩項對立」的區域類型，分布於閩方言鄰海北部區域、南部區域，該區域的文獻語料：《戚林八音》、《彙音妙悟》、《拍掌知音》、《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渡江書十五音》、《八音定訣全集》等反映了這種現象的一致性，概以喉擦音聲母最為活躍，屬於喉擦音的中古來源亦頗為混雜。以發聲類型而言，呈顯出閩方言內陸→鄰海→島嶼區域推移過程，喉音成份轉趨為重的語音現象。以區域徵性言之，可謂為「後位優勢」。整體而言，喉擦音「向後推移」的作用力，帶動唇音、舌音和牙音的「後位移動」（backward movement），一方面可證之於閩語鄰海區域的文獻語料與島嶼區域的方言材料，另一方面可以解釋閩方言聲母白讀類型，不同音類來源而共同趨向於喉擦音的因素。澎湖群島島民所

<sup>470</sup> 貫串此論題而分別置於各章節的次要論題，約略有五：一，澎湖群島閩方言與內部區域歷史文化的問題。二，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各次方言區域、文獻語料的音韻現象問題。三，澎湖群島閩方言  $\text{ϕ}$ -聲母類型與閩方言文獻語料、分布區域的相關問題。四，澎湖群島閩方言  $\text{-vʔ}$  韻母類型與閩方言文獻語料、分布區域的相關問題。五，澎湖群島閩方言  $\text{-io}$  韻母類型與閩方言文獻語料、分布區域的相關問題。

體認的母語音腔爲重的聽覺感知，其關鍵很可能即在於音節結構的向後延展所致。

二，韻母結構  $\text{ʔvʔ}$ 、 $\text{vʔ}$ 、 $\text{ṽʔ}$  的類型與地理分布（第三章第二節、第四章第一節）：閩語內陸區域、鄰海以至於島嶼區域帶有喉塞音  $\text{ʔ}$ -、 $\text{-ʔ}$  的音節結構，約略有三種類型：A.  $\text{ʔvʔ}$ 、B.  $\text{vʔ}$ 、C.  $\text{ṽʔ}$ ，A 類型存在於海南島，屬於該區域民族語言與漢語方言的融合產物，B、C 兩種類型則未見於閩方言內陸區域，僅出現於鄰海、島嶼區域，其可能原因在於喉部擦音「 $\text{h}:\text{ʔ}$ 」的「平衡關係」(counterbalance)。以澎湖群島母語者而言，許多非「入聲字」的音節單位，在語流過程中，仍然帶有「 $\text{-ʔ}$ 」的成分，正代表著喉部「 $\text{-ʔ}$ 」的實質內容爲「 $\text{-h}$ 」，可以解釋 A 類型韻尾與聲母的差異，亦可以解釋 B 類型入聲、非入聲的區野。至於 C 類型的形成，則與舌根「 $\text{ŋ}$ 」有關，閩方言內陸區域與鄰海北部區域，具備了一種韻母結構：「 $\text{viŋ}$ 」（「 $\text{v(i)ŋ}$ 」），這種韻母結構與閩方言鄰近客贛方言區域「 $\text{v(i)t}$ 」的差別，在於舌部韻尾「 $\text{t}:\text{ŋ}$ 」。閩北移民東向、南向是閩方言鄰海區域形成  $\text{v(i)ŋ}$  和  $\text{ṽʔ}$  的因素之一。閩東移民北向閩方言內陸區域移徙，南向閩方言島嶼區域拓殖，則可能是形成閩方言內陸區域  $\text{v(i)ŋ}$ ，以及鄰海南部區域  $\text{ṽʔ}$  音節結構類型的因素之二。簡單的說，以閩方言內部區域文化中心而言，閩東、閩北具備了同時向外進行「雙向擴散」的可能性，其一是兩個區域的交互影響，其二是兩個區域共同向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以及島嶼區域的推進。

根據閩方言的文獻語料，「 $\text{viŋ}$ 」的結構分別見於《戚林八音》「賓、燈」兩韻、《建州八音》「人、販、田、園」四韻，以中古條件而言，《戚林八音》「賓」字韻爲臻深兩攝三等字、梗攝三四等，「燈」字韻爲曾一、梗二。《建州八音》「人」字韻以臻深兩攝三等字爲主，次爲梗開四、梗合三、梗開三、曾開三，「田」字韻爲曾三、山一和山二，「園」字韻爲山三，「販」字韻爲咸山兩攝三等字。以學者所構擬的音讀形式言之，《戚林八音》「賓、燈」別爲「 $\text{aiŋ}$ 、 $\text{eiŋ}$ 」兩讀，《建州八音》「人、販、田、園」的音讀形式分別爲「 $\text{eiŋ}$ 、 $\text{aiŋ}$ 、 $\text{yiŋ}$ 、 $\text{uaiŋ}$ 」。「臻深」兩攝是《建州八音》、《戚林八音》「 $\text{viŋ}$ 」音韻結構主要來源，以《建州八音》「 $\text{viŋ}$ 」音韻結構的來源言之，「人」字韻以「臻、深、梗、曾」的序列歸併，餘則以「曾山、山、山咸」合類，以韻類重組排列的意義言之，今日內陸區域石陂  $\text{aiŋ}$ 「曾一梗二」類型的形成，很可能是受到鄰海北部區域移民影響所致，從而形成的晚期類型。必須考量的是，以閩方言音韻結構類型的連續性爲基礎，「 $\text{viŋ}$ 」結構今日能夠廣布於其他中古來源韻攝的因素，除了鄰海北部區域持續影響之外，或許是與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 $\text{vʔ}$ 」、「 $\text{ṽʔ}$ 」結構類型接觸所致，檢視「 $\text{viŋ}$ 」結構的

對當形式「vʔ」、「ṽʔ」，其於《彙音妙悟》、《拍掌知音》、《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渡江書十五音》、《八音定訣全集》的中古來源，可有三類：(1) 通攝、宕攝、梗攝、曾攝，(2) 山攝，(3) 假攝、蟹攝、效攝、果攝。

初步觀察閩方言內部區域「v(i)ŋ」音節結構類型，閩方言內陸與鄰海北部區域，因採取舌位「高化」策略，從而削減-ŋ尾向後的動力，使得兩個區域未有鼻化的音節單位產生。閩方言鄰海南部以及島嶼區域，在舌根音和喉部擦音雙重「後化」的條件下，帶動整個共鳴腔濁化，鼻化韻、鼻音音節和聲化韻的起因導源於此。至於閩方言島嶼區域唯一不進行鼻化規則的海南島，其主要因素是受到ʔvʔ音節結構雙重塞化的類推影響，轉而採取折衷的「低化」策略，阻礙了共振的張力。以「vʔ」、「ṽʔ」的音韻結構類型而言，澎湖群島受到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的影響相較其他區域為深，與明清時期漳泉二府海賊來往返復，削弱其他影響源的作用力有直接的關係，顯示兩個意義：(A)「區域方言音韻規則」>「通語音韻規則」、(B)「閩方言區域內部音韻規則」>「鄰近方言區域音韻規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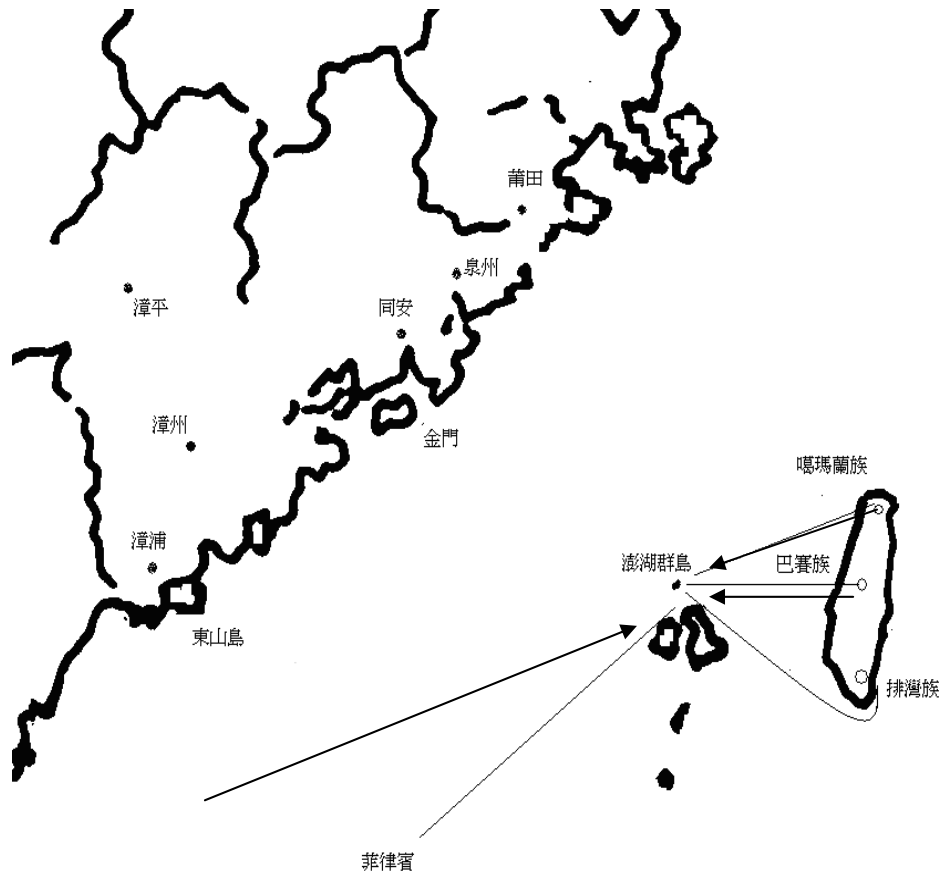
三，韻母結構-io的類型與地理分布(第三章第二節)：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的文獻語料，共通的韻母問題在於後部圓唇元音o、u、io的來源，觀察《建州八音》茄韻內語例的中古來源，一類是與澎湖群島湖西鄉二十二村一致的中古遇攝字組，另一類則是與《戚林八音》橋韻、《彙音妙悟》燒韻、《拍掌知音》、《彙集雅俗通十五音》韻、《渡江書十五音》韻、《八音定訣全集》燒韻一致的中古效攝、流攝字組。閩北石陂、將樂方言的調查語料，反映了《建州八音》兩種類型共存的真實性。澎湖群島-io韻母結構類型，其來源有別於閩方言鄰海北部、南部區域的文獻與方言調查結果，呈顯出與閩方言內陸區域的相同形式，間接證實閩方言內陸→鄰海→島嶼區域的「鏈移動線」，並非僅是聲母層面的單純發展。

## 第一節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類型與分布的初步詮釋

### 一、澎湖群島「南島語/漢語」共存的設想與論證

本文根據日本學者岩永六一、伊能嘉矩、安倍明義，以及法國傳教士唐維爾所觀察澎湖群島島嶼名稱的相關記錄，設想「漢語/南島語」曾經共存於澎湖群島。推測「南島語族」當時的動線，或可如【圖41】所示：

#### 【圖41】南島民族移徙澎湖群島設想圖



以往研究臺灣地區南島民族的遷徙路線，主要是基於考古學、人類學的設想，至於以語言學檢證的可能性，李壬癸、臧振華兩位先生所代表的意見差異，或許可有融通之處。澎湖群島南島語島名的殘存，帶來了一絲線索，本文第一章的分析，意即【圖 41】的論據在於三點：

第一，「吉貝嶼」島名名稱究竟為何？學者多以島形進行解釋，然而，透過實際語言調查、並參酌相關文獻記錄<sup>471</sup>，以及宋元時期史書《諸蕃志》、《嶺外代答》、《島夷志略》、《真臘風土記》所記載「吉貝」的材料（第一章第一節），輔以南島語語料、構擬結果的比較（何大安 1997），我們論證了「吉貝」當為南島語的漢文轉寫。這個說法，有助於思考南島民族在中國大陸東南海域的移動路線<sup>472</sup>。

<sup>471</sup> 鳥居龍藏（1903）於澎湖群島所進行的人類學調查，發現其與馬來民族非常近似。其所用衣著的原料，或當即是所謂的「吉貝」（木棉）。

<sup>472</sup> 必須補充的是，或許有學者會對於吉貝島是否有木棉作物，產生懷疑。不過，以吉貝島漁夫撈捕漁法言之，或亦與西村朝日太郎（1974）言及海洋民族漁具使用「木棉材質」有所關聯。

第二，「目斗嶼」的「目斗」究竟為何義？歷來說解亦有不合理之處。我們嘗試將法國傳教士唐維爾所作的記錄，以及早期排灣族射馬干一支對於眼球、睫毛的音讀形式作一比較，初步推斷「目斗」或亦為排灣族語的漢文轉寫，而「吉貝」一詞則與臺灣北部巴賽族，和宜蘭平原噶瑪蘭族具有「同源」的聯繫。

「吉貝」、「目斗」的證據，顯示臺灣地區南島民族至澎湖群島的路線，或許是「雙線」的方式，作一暫時性的設想<sup>473</sup>。

一，透過考古學、歷史文獻的分析（Tsang 1992），或可確立宋元時期漢人曾澎湖，但是，觀察明實錄「海賊史料」（第一章第一節）以及明清史料（第四章），我們認為，漢語通語確立時間點當為「明清時期」。

二，考古的資料顯示，漢族人口最早至於澎湖湖群島當是宋元時期（Tsang 1992），對應於漢語史，則為近代漢語的發展階段，有宋以來漢語音韻學史的思考脈絡，是以，以《切韻》「音類」作為觀察澎湖群島音韻現象的「基本單位」，便有其內在理路的合理性。但是，「宋元時期」的澎湖群島，顯現的是「文化時間」。

明清時期，閩方言內陸區域、鄰海區域皆有文獻語料（第二章第二節），或亦顯示漢化的程度較深。以明清時期，漢語東南方言海域「海賊」的侵擾，與日本琉球的商業活動言之，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類型形成時期，或當定位在「明清時期」。

##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結構類型及其地理分布

本文所謂的「類型」（pattern），含括方言音韻現象、區域徵性以及文獻語料的語音線索。「分布」（distribution），則代表著一種供應、傳輸完成過程，形成具有與中心區域相類的區域徵性。「分布」與「文化中心」是一組不可割離的概念，則是我們進一步延伸方言地理學基本思想所得到的啓示。

### （一）澎湖群島閩方言聲母結構類型及其分布區域

澎湖群島閩方言聲母類型與地理分布，主要分為兩大方向：

---

<sup>473</sup> 吳安其（1994）曾指出朝鮮語當中音韻、詞彙和語法皆有與南島語對應的語料，並由歷史證據推估北魏時期高句麗遷至朝鮮半島，說明南島民族的影響。或可顯示南島民族於中國大陸狹長海岸線移動的可能性。

第一，澎湖群島閩方言輕唇音[ɸ]的特字類型，在湘語、廣西平南閩語、海南島以及吳語區，皆存在此種音讀形式。果若以歷時的線索追尋，亦可發現明代琉球對音語料，殘存相近的現象。以「核心區域」而言，湘語或許是擴散源，主要在於湘語[ɸ]形式，來源於中古輕唇音非系字與喉音曉匣兩母，澎湖群島、海南島和吳語區[ɸ]形式，中古條件皆為輕唇音非系字，而廣西平南閩語則為喉音曉匣兩聲類。至於何以湘語在唇音部份，造成如此影響？或與東南漢語方言的歷史發展有所關聯，有待於進一步的研究。澎湖群島舌音聲母中古端系[t : h]形式的地理分布，其語例雖僅有「大」，但是，問題在於「大」指其概念，其為音讀為[hai]屬於「有音無字」的情況，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閩南方言區）內部的晉江、同安、漳州和漳浦，四個方言點具有相同的音韻現象。澎湖群島牙音[ŋ : g]的對當，與閩方言島嶼區域的海南島牙音類型相近。閩方言內陸、鄰海區域，[ŋ : g]的對比，正好是內陸、鄰海地理類型的區別。從這個角度看來，澎湖群島、海南島島嶼內部的差異，很可能是由閩方言內陸、鄰海區域「疊置」(overlapping)，這種現象呼應了方言地理學所提出的邊境殘存原則。澎湖群島喉音的今讀形式同樣可分為兩類：一，「虎」在七美鄉南港村讀為[hɔ̃<sup>51</sup>]，此處的[h]聲母，與吳語帶音[ɦ]聲母相近，或許可能是[ɦ]聲母「+voiced」屬性，致使其後元音產生鼻化。二，[k]、[h]的形式可見於閩方言島嶼區域，然而，閩方言鄰海、內陸區域則另有[x]的形式。澎湖群島半舌音、半齒音與閩方言島嶼區域，基本形式有著對當的關係。至於「熱」的音讀，海南島與潮州皆呈現文、白讀的相近形式。

第二，澎湖群島齒音今讀形式大致分為兩類：

一，「舌」，今讀呈現「顎化」的舌尖面塞擦音，檢視其中古條件為船母，屬章系字。與之聯繫的則是閩方言內陸區域永安、三元和沙縣三處，其中古章系字今讀皆為舌尖面塞擦音。

二，「誰」的音讀形式與鄰接區域的關係如次：

tsui <sup>55</sup> a <sup>3</sup>	taŋ <sup>51</sup> tsui <sup>13</sup>	白沙瓦硯	漳平永福方言	A	
ti <sup>51</sup>	lan <sup>13</sup>	白沙赤崁	東山島	tii <sup>3</sup> niẽ <sup>2</sup> 四甲	B
tian <sup>13</sup>		馬公、西嶼、望安	海口、遂溪	C	
taŋ <sup>13</sup>		西嶼小門村、竹灣村		D	
teian <sup>55</sup>		馬公興仁里、烏崁里		E	
taŋ <sup>13</sup> a <sup>5</sup>		花嶼、七美海豐		F	

是以，若以圖表顯示澎湖群島聲母與其鄰近區域的關係，請看【圖 42】：

**【圖 42】澎湖群島閩方言聲母類型與分布區域**

	澎湖群島	類型相近區域
唇音	西嶼	湘語、海南島、吳語區
舌音	馬公、湖西	閩方言鄰海南部、內陸建寧
牙音	西嶼	海南島
齒音	湖西	閩方言內陸區域永安、三元、沙縣
喉音	七美	吳語區
半舌 半齒音	馬公 湖西 西嶼 白沙 望安 七美	海南島、閩方言內陸區域、鄰海區域

【圖 42】顯示澎湖群島聲母類型，可至於漢語東南方言湘語區，並可與閩方言島嶼、鄰海和內陸區域相互接軌，爲了進一步說明澎湖群島聲母的語音徵性，初步整合澎湖群島聲母的發音部位，如次，請看【圖 43】：

**【圖 43】**

唇音	舌音	牙音	齒音	喉音	半舌齒
□	t-	g (ŋ)	t- ts-	k	l-
-----					
ϕ	h-	h-	tʃ-	(f) h-	h-

【圖 43】以中古唇、舌、牙、齒、喉、半舌半齒的序列編排，若以虛線區隔今讀形式的層次音讀，必然會提出一個直接的問題，何以澎湖群島舌、牙、喉和半舌齒音皆呈現[h]（喉清擦音）類型？

澎湖群島閩方言聲母的共同現象，可以視之爲「喉部發達」地理類型區域。至於原因，一方面是整個音節結構呈現「後位優勢」所致（何大安 1988），另

一方面，聲母與韻尾雖然皆採取「後化」的策略，但是無形中，卻使得整個音節呈現「平衡」的狀態<sup>474</sup>，

莆田、仙游 ʃ 聲母的問題，若以閩方言內部區域的音韻現象作為解釋的基礎，發現聲母 s→t 的類型（何大安 1988），海南方言可以為代表，閩東 ʃ 聲母可謂為同一發音部位，在發音方法差異之下，所顯現的「中段進程」，其全程可為「s→ʃ→t」，而海南方言代表著這個音韻鏈移的完成。由擦音逐步「塞化」，與閩方言鄰海北部、南部區域聲母喉塞化的共同趨勢，或有直接關聯。

閩東移民曾至海南島以及其他閩方言島嶼區域，明清時期海賊侵擾的區域範圍至廣，以莆田、仙游正位於臨海北部區域的海灣入口推測，或許會較上溯至壯語等民族語言，在論證過程方面，能夠提供較為完整的邏輯思路<sup>475</sup>。

## （二）澎湖群島閩方言韻母結構類型及其分布區域

以澎湖群島湖西鄉二十二村普遍存在的-io 韻母而言（第三章第二節），其中古來源條件皆為遇攝字組，初步分析閩方言內陸、鄰海北部和南部區域的文獻語料，《建州八音》茄字母韻內，呈現兩種類型：一種是與《戚林八音》橋字母韻、《彙音妙悟》和《八音定訣全集》燒韻相同的流攝、效攝來源，一種是與澎湖群島相同的中古遇攝來源。這個現象顯示兩種意義：

一，閩方言內陸區域向島嶼區域推移的歷史痕跡：

澎湖群島-io 韻母的音讀形式，不僅讓我們重新思考「移民與方言形成」的歷史課題，更讓我們深深體會到閩方言「文獻語料」當視之以「整體」

（wholeness）。今日對於文獻語料音韻系統的描寫，主要是受到高本漢的啟發，藉由現代方言的語言形式，建立起與文獻對當的可能性，以期尋求構擬的基礎。換言之，「音類」與「形式」兩個概念，實則貫串了「文獻語料」與「現代方言」。現代方言的資料，自高本漢以來已然累積為數更為龐大的數量，今後亦將不斷增累，然而，文獻語料的數目是已然確定的，嚴謹的說法當是，擺置於時間軸上的文獻語料，透過空間軸上方言的地理分布，方有具體的形式符號作為詮釋的基礎。

<sup>474</sup>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澎湖群島區域雖有差異，其於中古平、上、去、入四個調類的今音調值，卻呈現一個共同的 33 基調（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陽去、陽入），很可能可以為證。這一觀點，或可再與澎湖群島韻母類型的地理分布問題作一整合。

<sup>475</sup> 我們並不否定民族語言影響的任何可能性，畢竟漢語東南方言區域，其原先的方言和民族語言很可能處於共存的型態。



二，閩方言鄰海北部區域的雙向擴散：

「長江」為漢語南北方言自然界域，第二章第一節亦言及趙蔭棠先生將韻書分為南北之別。以金 韓孝彥、韓道昭《篇海類篇》一書，在明清時期韻書作者音韻認知（phonological cognition）的影響為本，北至明萬曆徐孝《合併字學集篇》<sup>476</sup>，南至清乾隆年間《戚林八音》，在文字、音韻學的思維皆有相近的思路。有清以來閩中地區，或亦音韻錄出（李如龍 2001），然此間所反映的是清代方言學者對於「地理區域」與「言語差異」的思考，而這條思路，則是明代以來韻書、韻圖抑或字書纂作者的主線。順乎此，有清一代專研於文獻材料的「古音學者」，以形聲字聲旁、形旁，各表音、義的區別，進而推展《詩經》「韻部」的侷限性。則又突顯出現代語言學當中，「語言地理學」、「比較語言學」的兩個學科之別，在明清時期似乎已有線索可尋之。

閩方言內陸區域，具有 *viŋ* 音節結構的區域包含石陂、政和、崇安、南平、明溪、三明、沙縣、建寧，至於蒲城、泰寧、將樂目前的語料似乎尚未發現類似結構單位，以理論層面推測，泰寧、建寧和將樂三個區域與客贛方言接觸頻繁，可視為重要線索。為什麼？客贛方言對等的音節結構「vit」的韻尾 *t*，與閩方言內陸區域「*viŋ*」的 *ŋ* 韻尾，前後力量均衡的結果，抵消了 *off-glide* 「*i*」的作用，因而建寧、將樂僅有「*aŋ*」而無「*aiŋ*」。 *viŋ*、*ṽ* 的音韻連續體，以中古條件而言，皆是屬於具備陽聲韻尾 *-m*、*-n*、*-ŋ* 的韻攝。從閩方言空間分布而言，*viŋ* 僅出現於閩方言內陸區域和鄰海北部區域，*ṽ* 僅出現於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和島嶼區域。具體言之，以中古條件作為詮釋的基礎，很可能無法完全解說閩方言區域內部鼻化、不鼻化分野的可能因素。是以，嘗試以方言地理學的觀念與方法，我們的解釋可分為三點：

一，方言文化中心說：方言地理學著重空間之外，並重視非語言本身的證據，含括文化層面的面向（第一章第二節）。閩方言「文化中心」的理解，可以「北人南下」的移民史觀作為初步的認識基礎，並在這個基礎之上，考量閩方言內部文化的發展，具體的說，「北人南下」所帶來的閩語相對時間為早，唐代、明清時期，則又分別以閩東、閩南區域為文化中心區域，其相對時間雖晚，*viŋ*、*ṽ* 的音韻連續體，正代表著閩方言區域文化的連續性。換言之，閩北、閩東 *viŋ* 的韻母結構，是兩個區域歷史接觸所形成的，*ṽ* 韻母則是閩南區域以及漳泉移民擴散所帶來的影響。

<sup>476</sup> 請參看呂昭明（2002a.b.）

二，如何解釋中古遇攝在澎湖群島閩方言讀爲-io形式？是許多學者所曾關注的課題<sup>477</sup>。檢視-io韻母在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長泰、漳州）等區域的中古條件，皆爲效攝、流攝字，全然無有遇攝字的情況，顯示這個韻母音讀的來源，恐怕不是透過漳泉及其次方言，可以獲得完整的解釋<sup>478</sup>。經由比較，我們發現在閩方言內部區域，僅有石陂方言-io韻母屬於中古遇攝一等（轄字不多，卻彌足珍貴）。這個證據，讓我們對於viŋ、ṽ結構的地理推移很可能是成立的設想，找到論證的基礎。

三，以海南島ʔvʔ的音韻結構言之，ʔ-、-ʔ所處的前後位置，造成整個音節「低化」，因而面對viŋ的韻母結構，屬於off-glide的[-i]便失落形成vŋ結構<sup>479</sup>。形成這種結構連續體的思路，主要還是以轄字的中古條件爲基礎，可以見得《切韻》音類仍是方言研究重要的結構單位。

四，若以《建州八音》、《戚林八音》aiŋ韻和島嶼區域東山島、海南島eŋ韻的中古條件比較，可以形成aiŋ：eŋ的對當形式，中古條件相近的情況，讓我們可以預想aiŋ的[-i]使得前a元音高化，終而形成eŋ的形式。至於何以海南島-ŋ韻尾不影響前元音鼻化的因素，很可能與前文所提出該區域ʔvʔ、ʔv音節結構有所關聯。

澎湖群島閩方言ṽ韻的形成，與其鄰接的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相同，一方面符合方言地理學的設想，另一方面，說明了明清時期漳泉移民的擴散，取代了其他的影響源。具體言之，何以閩北區域和海南島並無鼻化音節？理由即在於前者採取「高化」策略，後者則施行「低化」的發聲行爲。ṽ結構僅出現在採取「後化」的閩方言鄰海區域、島嶼區域。「後化」致使-m、-n、-ŋ等陽聲韻尾失落，從而能夠向左移位<sup>480</sup>。

## 第二節 澎湖群島閩方言音韻類型與分布的文化意義

澎湖群島音韻類型與分布的文化意義，主要在於兩點：

第一，認識島嶼方言與區域文化課題<sup>481</sup>：

<sup>477</sup> 關於學者們的說法，請參看陳昭蓉先生（2003）。

<sup>478</sup> 果若要由語音演變的角度說明-io是由-ou、eu變讀而來，需要由閩南方言內部找到「平行」的證據，最重要的是，文獻語料有無證據？果若文獻語料的證據指向，與方言調查結果扣合，研究者又無法提供有利的實驗語音學證明，則強作解人恐有失研究精神。

<sup>479</sup> 東山島雖採取相同的音韻行爲，但是形成因素恐怕與海南島不同，尙待深究。

<sup>480</sup> 誠然這當中還牽涉到b-、d-、g-聲母問題。

<sup>481</sup> 歷來以漳、泉方言思索澎湖群島閩南方言的音韻問題，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同時符合方

歷來學者談到澎湖群島屬於閩南方言區，以該區方言點進行比較研究。面對這個看法，我們的想法如次：

一，地理區域是靜置不變的，但是，區域語言的載體是人，人是會變動的，這是為什麼方言研究要思考移民問題的其中一個因素。至於閩方言區域內部移民問題，經歷閩北、閩東和閩南三個「文化中心」先後的移轉，終至構成一個近乎「區域循環」的音韻結構類型的連續體，或許可以豐富我們的研究視野。

二，歷史上，漢人南下的移民歷史，可以解釋若干語言的形成問題。但是，在漢人大批南下之前，屬於中國大陸的南方區域，應當已存在某些區域文化。以閩方言內部區域言之，閩北、閩東和閩南都在不同時期，形成該區域的文化重心之所在，閩方言「島嶼區域」向為避難、海賊侵擾之所在，以閩南方言作為澎湖群島閩方言比較基準，儘管亦符合方言地理學鄰接區域原則，果若考量族譜、日治時期普查以及閩方言內部區域歷史，或許，我們能夠擴大以閩南方言區域（本文視為閩方言鄰海南部區域）為取材的研究方式。

第二，區域文化的連續性，以及文獻語料、現代方言調查報告呈現連續體問題：

「『字』在『字表呈現』與『地表呈現』是兩種不同的意義」。這個觀念給予我們一個啟發，即是符合對應音讀的語言形式，並不一定在該區域的「語用」層

---

言地理學鄰接區域原則。然而，以本文所提出「方言與區域文化史」的課題言之，無論以漳泉方言，或是明代以來漳泉二府次方言，作為探索澎湖群島閩方言有可能過於狹隘，理由有五：

一，澎湖群島的開發早於臺灣。

二，澎湖群島在近代歷史，海賊活動的頻繁，及其作為漢語東南方言島嶼區域的樞紐位置，遠非單純臺灣移民問題，能夠作為全盤解釋的根據。

三，澎湖群島於日治時期的戶籍普查，除了漳州、泉州外，另有潮州、福州和歸屬其他而未知戶籍的人口，解釋了漳泉問題外，還必須解釋福州、潮州和其他未知的人口來源，方才為詮釋澎湖群島閩方言的基礎工作。偏於漳泉，對於島嶼分散的澎湖群島而言，會形成片面的認識。

四，以往的研究模式是：A. 澎湖群島的原鄉是閩南漳泉方言、B. 《彙音妙悟》以泉州方言為音系基礎，因此，以《彙音妙悟》的語料證明澎湖群島方言是泉州方言的次方言。這種論證方式，邏輯學稱之為「循環論證」(vicious circle)。實質的問題在於：《彙音妙悟》與澎湖群島的關係為何？黃謙是否為澎湖人？如果論證的資料，可以顯示兩者的關係，方有成立的可能性。如果這兩個問題的論證基礎並不存在，以《彙音妙悟》為主要調查語料，甚至未參考其他閩南區域的韻書，會產生過多問題無法解釋的窘境。未有文獻語料，是閩方言的島嶼區域的共同問題，語言調查工作，以現成的語言材料，從某種程度僅是提供調查者「便利性」，語言調查工作不會是這麼單調而經不起檢證的。

五，如果澎湖群島閩方言的原鄉在漳泉，如何反映其發展變化？是研究者必須說明的。而說明的客觀基礎即在於語音實驗，倘若無法提供語音實驗的數據，僅以經驗作為論證的前提，這種語言調查的意義與價值性是必須檢討的。這也是為什麼本文不擬採取語音變體調查為重點，轉而以音韻類型為主題研究的原因之一。

客觀的論證，不同於主觀的求證。「主觀的求證」訴諸經驗的判斷，無須任何說解程序，但是，為了某部文獻語料的擬音研究，而進行的語言調查工作，其研究動機與出發點，便很值得加以檢視與思考。

級，代表絕對多數<sup>482</sup>。更爲準確的說，當我們以所製字表進行調查，在某種程度層面，這種作法是方便研究者進行整理，但是，對於受訪者而言，是在配合研究者需求之下，提供所知的訊息，換言之，若以受訪者爲中心，則其日常語用的實際情況，與字表呈現是有其差距的。研究者視之爲「例外」的語例，有時候反倒是較符合該區域的日常語用。漢語方言分布區域廣闊，研究者勢必無法全然以「足跡遍至」的方式尋找研究的語料，透過調查報告著實不得不然，在未有「語境」的情況之下，研究者依據其所掌握的方言報告資料「各自表述」，這是定性研究的另一個侷限性。方言報告以「調查」爲主要工作重點，可是，研究者是如何對於該區域進行觀察？或許不應是停留於縣志等所認識的層面。語言學家不同於考古學家、人類學家，但是必須對於「人—區域文化—語言」的聯繫關係，有更深的體認。

潘茂鼎等（1963）除了將閩方言分成五個區域外，所羅列二十一張方言地圖顯示閩方言在音韻、詞彙的「內部差別」，可以「內陸區域」和「鄰海區域」劃歸之。但是，閩方言「島嶼區域」的歸屬爲何？尙屬於未明朗的階段<sup>483</sup>。1987年《中國語言地圖集》提出了六區的說法（實際上當爲兩區：閩語東三區、閩語西二區，與本文所言「鄰海區域」、「內陸區域」若合符節），對於閩方言「島嶼區域」則是將臺灣、金門和澎湖地區劃入閩南區泉漳片（將臺灣、金門和澎湖歸入漳泉片，一個基本的問題便是：漢族移民的時間層次不同，必須將漳泉片的音韻、詞彙層次釐清），海南島分立爲瓊文區，共有府城片、文昌片、萬寧片、崖縣片和昌感片（以泉漳片的視野思考臺澎地區閩南方言問題，是多數學者的取向<sup>484</sup>，將海南島歸於五片，以內部而言，其與海南少數民族語言的關係遠近，具體內容爲何？其與閩南區泉漳片、潮汕片的關係爲何？）不過，以比較語言學的思路，將各個區域歸於某某片的作法，恐怕無法獲得系統性的知識架構。明確的說，目前學界似乎仍將比較語言學與語言地理學，視爲「空間」與「時間」的差別，事實上，兩種學科的基本思想很可能有著具體的差異，意即語言觀認識的基礎不

<sup>482</sup> 這裡隱藏一個可能的問題，早期方言調查的方法，往往以一個發音人作爲代表，基於調查的「便利性」，發音人的年齡通常都是青壯年爲主，但是，將代表某個區域的發音人作一個完整的語言調查，和我們親身到該區域實地踏查，實際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以個人代表區域」，後者是「在區域內部尋找個人的定位」。

<sup>483</sup> 此時將「金門」歸於「閩南區」，其音韻論據爲何？依憑語言材料爲何？藉由明代文獻語料，已於第二章第一節略作說明（明初「移徙政策」提出、執行之後，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已告落幕，明代文獻語料分區的音韻條件）。若將視角集中於東南方言區而言，則有「近江」、「遠江」的概念（張光宇 1993），至於閩方言「五區」、「六區」的思路，可以說是研究傳承下的集體意識。

<sup>484</sup> 請參看Kubler 1978、張振興 1988、洪惟仁 1996、張屏生 1996。

同，這是爲什麼本文以較大篇幅徵引譯介日本方言地理學的主因。

## 一、澎湖群島閩方言與閩語島嶼區域的歷史文化聯繫

### — 「漁獵型」類型觀點的延展

閩方言島嶼區域的聯繫條件有三：一，以漁獵生活爲主，二，歷史上有著共同的移民人口來源—閩東，三，皆與鄰接區域方言音韻類型相近，並保存閩方言內陸、鄰海區域的殘存現象。

歷來澎湖群島的閩方言研究，學者們的論述有一個共通模式，概以說明族譜、戶籍資料爲先，探討語言現象於次。但是，族譜、史料，是否能夠與語言現象本身直接畫上等號，或許是值得討論的，根據第一章的分析，我們認爲：

第一，各姓氏族譜能夠保存較完善的，多是人口數量較爲集中的家族，澎湖地區的十大姓，與金門地區族譜雖能有所接軌（請參看第二章），可是針對澎湖地區方言現象的複雜性而言，需更謹慎客觀的由「時間」與「空間」兩個角度，重新估量人口來源與語言現象的交叉脈絡。

換言之，以族譜作爲語言來源的前提，仍需要思考族譜所記錄祖系、子系其所使用的語言情況，若是這一點無法獲得論證，就必須將族譜作爲「直接證據」的價值，轉降爲「間接證據」。更爲具體的說法是，「人—區域—使用語言」的三角關係，需要更細緻的分析。

第二，以族譜探求人口來源，誠然有助於梳理語言問題，可是卻又帶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過去在澎湖群島漢語方言的調查工作上，是先設想以「閩南」方言作爲申論的前提，問題在於，如果臺灣地區方言複雜性以「鹿港」爲最，澎湖地區方言卻又較鹿港爲複雜，試問，如何具體說明同爲閩南方言「複雜性」的音韻規律？或是先以地理類型爲起點，思考語言地理分布區域與移民來源的可能性？次者，光復後的澎湖，居民多移居高雄、屏東、台南，是否帶回新的語言結構回到澎湖？以親屬稱謂詞、人稱代詞「誰」爲例，澎湖群島與閩方言島嶼區域、鄰海區域的關聯性，或可如次：

詞彙	金門瓊林	西嶼鄉竹灣村	西嶼鄉內垵村
祖輩	a <sup>33</sup> tso <sup>51</sup>	an <sup>55</sup> tso <sup>53</sup>	—
祖父	an <sup>35</sup> koŋ <sup>55</sup>	an <sup>55</sup> koŋ <sup>33</sup>	aŋ <sup>24</sup> koŋ <sup>44</sup>
祖母	an <sup>35</sup> mā <sup>51</sup>	an <sup>55</sup> mā <sup>53</sup>	am <sup>24</sup> mā <sup>42</sup>
姑姑	an <sup>35</sup> ko <sup>55</sup>	—	aŋ <sup>24</sup> ko <sup>4</sup> a
姑丈	an <sup>35</sup> tiū <sup>33</sup>	—	—
父親	—	—	am <sup>24</sup> pa <sup>44</sup>
母親	—	an <sup>55</sup> bu <sup>53</sup> / an <sup>55</sup> niã <sup>13</sup>	am <sup>24</sup> bu <sup>42</sup>
叔叔	—	—	an <sup>24</sup> tsik <sup>24</sup> a
哥哥	—	—	an <sup>24</sup> hiã <sup>44</sup>
姊姊	—	—	an <sup>24</sup> tse <sup>42</sup>
弟弟	—	—	an <sup>24</sup> siɔ <sup>24</sup> ti <sup>22</sup>
妹妹	—	—	an <sup>24</sup> siɔ <sup>24</sup> be

詞彙	閩方言區域	澎湖群島
誰	tsui <sup>22</sup> a <sup>4</sup>	漳平永福方言
	taŋ <sup>31</sup> tsui <sup>35</sup>	白沙瓦硯
	ti <sup>11</sup> laŋ <sup>35</sup>	東山島
	tiĩ <sup>3</sup> niẽ <sup>2</sup>	四甲
	tiaŋ <sup>13</sup>	海口、遂溪
	taŋ <sup>35</sup>	馬公、西嶼、望安
		西嶼小門村、竹灣村
		七美海豐村
	tɕiaŋ <sup>55</sup>	馬公興仁里

以前文所示語例言之，我們初步可以提出兩組問題：一，何以澎湖群島與金門瓊林親屬稱謂詞同為[an]（[am]、[aŋ]）詞頭（第四章）？二，何以澎湖群島人稱代詞與閩方言島嶼區域、鄰海、內陸區域，甚而吳語區形成 A、B、C 三組的對當關係（第四章）？二，如果將澎湖群島敏方言全然視之為「同安方言」的「遺裔」，則如何解釋人稱代詞澎湖群島、閩方言島嶼、鄰海和內陸區域的聯繫問題？因此，本論文不斷反覆重申的概念即在於「移民與方言形成」的課題，必定要顧及「語言現象與文獻語料接軌」，而此正為論述的前提。

海南島內民族雖複雜<sup>485</sup>，民族語言卻劃歸為「漢藏語系、南島語系」兩大支系《海南省志·方言志》（1994：247），現在的問題便是，為什麼「回輝話」屬於南島語系？

《瓊山縣志·卷九·雜誌遺事》記載元代的一段文字，頗值得玩味，徵引於次：

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因烏泥涇其地，土田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植之。初無踏車、推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厥功甚艱。元初時，有一嫗名黃道婆者，自崖來，乃教以做造桿彈紡織之具。至于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織成被褥、帶，花錦粲然，人競效法，轉貨他郡，家各殷富，未幾，嫗卒，莫不感恩灑泣而共葬之。又為立祠，歲時享之，越三十年，祠毀，鄉人趙愚軒重為立祠，復毀，無復更立者，道婆之名，日漸泯滅無文矣。

這段文字顯示三個意義，其一，松江府開始種植「吉貝」的因素，在於土壤貧脊，民不聊生。其二，松江府人如何能夠具備，將「吉貝」紡織成紗的能力？是受到「崖」來的老嫗「黃道婆」所教之，此處「崖」或可指海南「崖州」，至於「黃道婆」為何人？恐待深入探究。其三，何以崖州黃道婆，能夠將名曰吉貝的木棉織成被褥，並且挈花、配色？儘管我們尚不清楚海南島對於「吉貝」的稱謂，其實際的音值為何？但是，以此段行文與第一章所徵引的史料，以及烏居龍藏（1903）對於澎湖群島居民的人類學觀察，進行合理的推估。我們相信「黃道婆」或許是屬於「南島民族」。如果這個推論站得住腳，那麼，我們臺灣噶瑪蘭族、巴賽族，澎湖群島吉貝島具有同源形式的稱謂，當可與元代海南島崖州地區，相互接軌。果若這個推論可行，繼之而起的便可將南島民族於元代分佈的島嶼區域作一聯繫，亦即：臺灣、澎湖群島（吉貝島）和海南島（崖縣），同時可以解釋今日海南島何以存在劃歸南島語族的「回輝話」。

## 二、澎湖群島和「漁獵型」類型地理分布的接續問題

### 一文化生態學、海洋民族學的觀念與方法的整合

以畜牧型、農耕型的地理類型，解釋漢語南北方言語序結構的差異問題，可

<sup>485</sup> 無獨有偶，歷來學者對於海南島人口來源，究竟為「潮汕」（周振鶴 游汝杰 1986：37）？還是「莆田」、「漳泉」（符玉川 1996：20）

以說是橋本萬太郎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橋本萬太郎 1978、1980），針對澎湖群島及其所鄰接「漢語東南方言」區域當中的「島嶼」區域，或許可以接續「畜牧型」、「農耕型」的想法，「漁獵型」地理類型的基本設想，轉而提出三角對立的地理模型。

第一，歷來學者多將臺灣閩南方言粗分為「泉州腔、漳州腔」之別，亦時而考量福建泉州話、漳州話的細微差異，以作為解釋臺灣地區閩南方言形成的來源，可是，這個思路背後，以「移民」的歷史依據為基礎，能否作為語言層面的判準（postulation）？是必須進行更細微的論證。

第二，透過金門瓊林、海南島和澎湖群島皆屬於閩方言島嶼區域，其親屬稱謂詞、人稱代詞，以及形容詞形式結構，一方面是語言關聯的直接證據，另一方面，其區域間的語言類型，似又隱約地顯現其地理圖像的聯繫性。是以，在第二章我們又徵引文化人類學、海洋民族學的學科概念，作為詮釋「漁獵型類型」的基礎。

換言之，為什麼本文要提出「漁獵型類型」，用以解釋閩方言島嶼區域「邊境殘存」的現象？一方面，是基於閩方言島嶼區域在歷史上「語言與文化」的聯繫，另一方面，所謂「漁獵型類型地理學」的思路，其根源實已孕育於橋本先生當初的設想。橋本先生談到：

インドヨーロッパ語の話し手の経済の中核をなしたのは、古代から地中海を中心とした通商であった。してみると、インドヨーロッパ語で、数詞が親族名称のようなものよりも安定していたというのも、なにもそれが基礎的であるというような理由によるのではなく、この地中海を中心とする通商圏を維持させるために不可欠であったからである、という簡単明瞭な必要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からうか。

マライポリネシア語族と総称される言語の話し手が、西はインド洋西端のマダガスカル島から東はポリネシアのハワイ群島まで、南はメラネシアから北は台湾（もしかしたら朝鮮半島南端の伽）までという、当時の航海術の常識では想像もつかないような広大な地域の拡がったのは、これと関係があるのであろうか。いずれにしても、このように急速に拡がって、各地で孤立して発達してきた言語を除けば、農耕民型の言語は、その中心の言語による同化と不断の借用関係のために、その同化のメカ



ニズムと過程を解明することなしには、インドヨーロッパ語について成功したような、比較方法による祖語の再構は非常に困難である。<sup>486</sup>

如果說南島語（Austronesian）與侗台語（Kam-Tai languages）具有發生學的關係（倪大白 1994），則湘語、吳語先喉塞音聲母，便是漢語與百越語接觸的一項證據。另外，或有學者指出「留在大陸上的古南島人可以分成兩部分，一種是已經漢化的閩粵吳人，另一種是受中原文化很大影響，但尚未完全漢化的操壯侗、苗瑤語言諸族」（鄧曉華 1994）。依據橋本先生的說法，或可解釋原南島語何以絕跡於大陸區塊的疑惑，我們相信，這個問題與南島語族屬於「漁獵型民族」有所聯繫，換言之，南島民族的文化生態（隨著人口增加，糧食短缺等等，而向海洋發展，請參看第二章第一節），逐漸難以適應大陸區塊農耕型、畜牧型的生活模式，其不為同化，全然脫離該文化體系，而廣布於更大區域的大小島嶼當中，是以南島語族遍布的範圍之廣，可以想見對於「海洋」的依賴性。從這個角度看來，這是本文正式開展「漁獵型類型」的另一層意義。

爲了突顯澎湖群島與閩方言島嶼型區域的音韻類型問題，我們合整文化生態學以及海洋民族學的學科觀點，接續並擴展橋本萬太郎先生（1978）以大陸版塊概念，所提出「畜牧型」、「農耕型」兩種語言類型的地理分布研究，並具體提出「漁獵型類型地理學」研究的主張。整體而言，「移民與方言形成」的課題，應以「語言現象與文獻語料相互接軌」（cor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phenomenon and documentary materials）作爲論述前提。至於澎湖群島閩方言與區域文化史的主要課題，在於漁獵生產方式所主導的漁村生活模式，所給予我們的啓發。從理論層面言之，我們認爲漢語方言類型地理學的研究，應採取「畜牧型」、「農耕型」、「漁獵型」三個文化面向，重新予以認識。

---

<sup>486</sup> 筆者譯文：熟稔印歐語的經濟中心，從古代以來將地中海作爲核心區域。以印歐語而言，數詞，類似親屬稱謂詞般穩定。然而，並無以之爲基礎的理由。爲了維持地中海爲中心的商圈，因此其不可缺乏，所謂簡單明瞭。能夠總稱爲馬來波利尼西亞語族的人，所謂從西邊印度洋西端的馬達加斯加島，至東邊波利尼西亞的夏威夷。南到美拉尼西亞，北至臺灣（朝鮮半島的伽）以當時的航海技術的常識而言，實在無法想像有這麼廣大區域的擴展，是否與之有關係呢？準此，類似此種急速擴展，如果排除各地孤立而發達的語言。農耕民型的語言，因其依據中心言語的同化以及持續的借貸關係，將其同化的機制，分析清楚，類似印歐語成功的情況，依據比較法重建祖語是非常困難的。